

# 教育口述史:功能、信度与伦理

刘来兵 周洪宇

**〔摘要〕** 教育口述史是教育史与历史学结盟的产物,其作为一项学术实践的兴起与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有关。教育口述史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教育实践活动中的人的记忆为主要对象,具有保存与解释教育史、形成参与教育史学、构建公共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教育口述史在实践中饱受叙事真实性、可靠性的质疑,从虚假记忆与不可靠的叙述两方面来分析其效度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教育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 教育口述史;功能;信度;公共教育史

教育口述史作为一项颇受追捧的学术实践的兴起,与当代哲学发生实践的转向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被纳入研究视野有关,口述史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传统的以文献分析为主要方法的教育史研究之外,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并有野蛮生长之势。教育口述史已然在很多族群、阶层和领域中呈现相当可观的成果,诸多现实表明,教育口述史正逐渐成长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并在当代教育史学实践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教育口述史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现象,还要成为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即应放置在元研究的视野之下加以考察。本文从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功能与信度两方面探讨教育口述史研究,提升丰富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品性。

## 一、教育口述史的功能

教育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提供史料,以个体的历史参与者身份叙述教育历史事件、行为等实践活动,同时带来教育史研究重心的下移,丰富教育史领域的内容。然而,我们在讨论教育口述史的功能时,不宜过分夸大,要求其承担书写完整历史的任务是不现实的。教育口述史的性质是从个体的角度叙述教育经历与见闻,它不可能要求口述者在叙述之前做系统研究。从学术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教育口述史的功能有如下几点:

---

刘来兵,教育史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9);周洪宇,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汉 430079)。本文是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教育学者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COA160167)成果。

### （一）保存与解释教育史

教育口述史的史料有两类,一类是传述史料,另一类是忆述史料。所谓传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长期留传下来的史料。在教育领域,历史上有诸多有关学校教学、教育思想家的口头传说以及民间故事,大多无法追溯其源头、辨识其真伪,但因其具有积极的教育价值,长期存在于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中。所谓忆述史料,是指当事人、目击者对教育活动的口头叙述。如《论语》便是至圣先师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们忆述的结集。自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诞生以来,多数名人在口述历史的作品中均有对其教育生涯的叙述,如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多处忆述其父亲的书院教育生活,他本人大学时期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生活等。忆述史料是教育口述史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当代教育口述史的实践中,主要致力于忆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它的表现形式为个人叙述、访谈叙述、他人忆述等,为保存鲜活的教育生活提供重要的历史价值。齐红深教授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亲历者口述调查,一共搜集到1200件日本侵华教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形成有《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流亡:抗战期间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历史》等代表性成果,如《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一书收录了44位日本侵华教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以历史亲历者的立场再现日本在侵华期间妄图通过教育奴化中国人民的过程。其中一位受访者夏德远这样描述1935年前后的日本侵华教育:“日寇为了实行奴化教育,还制定了一套礼仪节文,规定所有节日集会和其他重要集会,会序的第一项都是‘诏书捧读’,所读的就是《回銮训民诏书》,听者都要恭敬严肃,不得稍有懈怠。还规定每天朝会,都要举行‘帝宫遥拜’,首先面向东方立正,听到口令,鞠躬遥拜,完后,默祷三分钟。规定3月1日是‘建国节’,5月2日是‘访日回銮宣诏训民节’,昭和天皇的生日叫‘天长节’,还有一些其他节日。这些节日都要庆祝,庆祝时要求师生衣帽整齐,受执‘日、满两国国旗’。凡庆祝时都要呼万岁,每呼必是‘大日本帝国万岁’,‘大满洲帝国万岁’,一呼就是两个,不能单呼一个。”<sup>①</sup>从这段口述文字以及结合该时期的文档资料来看,尽管这是采访对象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记忆叙事,但仍然与当时的事实基本吻合,反映出日本在占领中国期间实行的是彻底的殖民奴化教育,它警醒中国人时刻牢记“勿忘国耻、复兴中华”。

教育口述史最主要的功能是保存与诠释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历史的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一是记录历史的档案,一是亲历者的记忆。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从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那里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sup>②</sup>尽管学界对教育口述史料的客观性仍有质疑,但从已经公开出版的教育口述史作品来看,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口述史料的“在场性”、“生活性”、“精神性”特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存史”与“释史”功能。所谓“存史”指的是口述资料包括录音、影响、自述等具有保存历史资料的功能,为当代教育史与未来教育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进而实现保存历史的目的。所谓“释史”指的是当事人通过口述历史还原历史事件的过程、细节,甚至更正文献资料因为某种需要而故意遗漏、篡改历史事实。这就是历史研究中常说的,历史研究需要时间的长度才能发现历史的真相。

“在场性”,是指口述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就是历史的“活文献”,是“无价之宝”,不能“眼睁睁地看其流失”。他们如实地述说自己的教育经历,能最直观地显示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师的教学如何在个体身上实现,实现到何种程度。“生活性”,是指教育的历史也是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可以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述历史。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不仅体现在教育与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体现在他那生活化的语言中,那是人人都能读懂的教育。“精神性”,是指口述者自己

<sup>①</sup>齐红深:《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sup>②</sup>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务实: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讲述一些背后的故事,不仅告诉我们做了什么,还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又是怎么看当初的决定,这些隐藏深处的精神历程对于我们解释某个事件和口述者的行为有直接的参考价值。<sup>①</sup>

## （二）参与教育历史生活

口述历史在教育史学实践中的应用有助于推动教育史研究者更多的参与教育历史生活,提升教育史学的参与品质。当代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史学界多次呼吁提升史学的参与性,他认为“历史学家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但前后两种参与含义不尽相同,如果用相近的英语词汇来表达,前者或可用participate,意即参加,亦即亲身实践;后者或可用enter,意即进入,亦即感悟贴近。”<sup>②</sup>关于历史学作用以及历史学家如何发挥历史的作用,不止于是历史学科自身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对历史学科的基本追问。正如法国年前学派的先驱马克·布洛赫所指出的,“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现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在充分肯定了历史学的价值与地位之后,他接着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sup>③</sup>因而,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历史学家,以人的活动与活动的人为中心,是关注的中心所在。参与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理解就是活着的人对过去所做的解释,回到历史现场去感悟过去的人与事,使当下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发生融合,进而构建新的历史生活。

教育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构成,更应成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在传统的教育史学实践中,思想史、制度史等宏大叙事占据主导地位,原本鲜活的教育生活世界被高度抽象化,不仅无法呈现多样化的教育生活世界,还使得教育史学者在这种研究范式的规训下埋首故纸堆中检索文献而忽略了教育改革实际。倡导参与教育历史生活是为了强调教育史研究应关注教育生活世界,教育史学者不仅要参与历史生活,更要参与现实生活,从生活中发现研究课题,从历史中发掘经验,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教育改革实践。教育口述史可以将教育史学工作者从书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服务与享受生活。传统的教育史研究者埋首于浩瀚的史料,可谓是“穷经皓首”。口述史需要他们走出书斋,与当事人进行晤谈。既为未来保存了此时不做以后将费更多的精力去研究也未必能发现的第一手史料,又让自己所做的历史研究有机会观照到现实,最重要的是能体验到书斋之外的生活。

## （三）构建公共教育史学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史学界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传统史学博士培养过多,许多史学博士完成学业之后,无法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教职而被迫改行脱离了史学界。公共史学的创始人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与韦斯利·约翰逊(Wesley Johnson)率先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始了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的试验。通过这个试验项目,凯利和约翰逊摸索出了一些培养公共史学研究生的新方法,并在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的创刊号上,凯利第一次公开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的概念,对其作了如下定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公共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当

①刘来兵:《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中国教育史学实践范式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1页。

②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③[法]马克·布洛赫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sup>①</sup>

如今公共史学在美国已经作为一门学科获得极大的发展,而在追溯其源头的实践时,研究者指出20世纪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共史学”实践是1936—1938年进行的前奴隶口述史项目。美国公共史学的真正推动力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新社会史学,新社会史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与公共史学要求史学研究的“公共参与”的追求不谋而合。<sup>②</sup>可以看到,口述史在公共史学实践中起到了开拓的重要作用。而当代中国的公共史学实践几乎与此同时,那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号召由人民来写“村史”、“家史”、“厂史”和“战史”的“四史”运动,出版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旗飘飘》这两套共17卷收录了老红军和老干部口述的革命史丛书。该时期有影响的口述史活动还有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事件实地的调查和研究。口述史在当代中国公共史学的构建中也愈发重要,教育史作为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理应考虑在应用教育口述史的同时逐步构建公共教育史学。

公共教育史学是指教育史学者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进入到社会公共事务或私人服务之中,包括与政府、企业、事业、学校、民间等领域的合作,以满足社会对教育史需要为主要目的。社会需要是教育史学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意味着教育史学在不断提升理论品性的同时,要注意发展自身的实践品性。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教育史学者进入公共领域,在推动社会公共进程中发挥作用,尤其是为国家教育决策咨询提供专业服务。口述史在公共领域发挥社会服务功能表现为:第一,口述史料可以与官方史料形成互补,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民间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现实。如果一项教育政策出台之前能先听听民间的声音,听听教师、学生的意见,或许会更成熟、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口述作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故事,融教育于生活之中,极富现实性和鲜活性,读来通俗易懂,具有大众教育的功能。口述史的教育功能还体现在它不是冰冷的“说教”,而是这些感性的教育生活故事和理性的人生思考让我们在身临其境中“自得”一份真意。

## 二、教育口述史的信度

西方教育叙事研究将口述史作为其中的一种形式加以讨论,包括自传和传记的收集分析、生活写作、个人叙事、叙事访谈、生活文献、生活故事、生活史、口述历史、民族史、民族传记、民族心理学、以人为本的民族志、流行记忆等局势叙事家族中的成员,而不同的学者对“叙事”表达了不同的理解:“个人经历的叙述,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讲述过去事件的故事似乎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我们必须以叙事的形式理解我们的生活”;“叙事是人类经验变得有意义的主要形式”。<sup>③</sup>然而,教育口述史在实践中饱受叙事真实性、可靠性的质疑,这与口述者在口述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叙述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有关,由于叙述主体的人是对过去的记忆叙述,其中叙述者的记忆、立场、理解等在讲述过程中的表现均是不可控制的变量,因而是口述整理者们所要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正是这一点,传统的教育史学者对口述历史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口述历史工作者应有勇气来面对这一问题,将口述历史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之一加以讨论它的信度问题是有必要的。

①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②王希:《把史学还给人民——关于创建“公共史学”学科的若干想法》,《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③K.Casey, “The New Narr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vol.1, 1995, pp.211—253.



### （一）口述历史叙述的有效性

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作为定性纵向研究(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而被广泛讨论。定性纵向研究又称为田野研究或实地研究,常使用的方法主要有:访谈法、观察法、档案记录法、口述历史法、焦点团体法、视觉影像资料、个人经验体悟资料等。定性研究的对象是文件资料,分析与诠释构成其基本方法,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肯·普卢默(Ken Plummer)所指出的,“世界上挤满了人类的个人文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写日记、收发信件、摘录文字、拍照、制作备忘录、撰写自传、建设个人网站、信手涂鸦、出版回忆录、撰写个人生平、留下自杀笔记、拍摄视频日记、在墓碑上写下纪念文字、拍摄电影、画画、制作录像带并尝试记录他们的个人梦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所有这些个人生活的表达抛向了世界,任何关心寻求它们的人都会对此感兴趣。”<sup>①</sup>这些有关生活的文件正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为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更加细微、具体的材料。社会传记作者和口述历史学家擅长挖掘各种上述的文件证据,将生活和时代的图像复合拼凑起来。文件如何被搜集、分析和应用,已经超越了作为研究的信度本身,还将伦理这一维度带入其中。

信度(reliability),又称可靠性,通常与效度(validity)一起作为重要衡量研究质量的两项重要指标。与量化研究可以通过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通过对比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来获得信度不同,口述历史中的信度与记忆有关。从心理学的专业视角来看,讨论记忆有两点必须要考虑:首先,人类的记忆有多可靠;其次,它有多有效?此处,可靠性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在多个不同场合讲同一个故事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有效性是指一个人对该事件的叙述与其它来源材料(如档案、日记、信件或其他人的口头报告)对该事件叙述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了证明记忆的可靠性,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的艾莉丝·霍夫曼(Alice M. Hoffman)用十年的时间对她的丈夫霍华德·霍夫曼(Howard S. Hoffman)(二战士兵,心理学家)进行追踪研究,他们在1990年出版研究论著《记忆档案:一名士兵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堪称记忆史、口述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在艾莉丝与其丈夫的研究中,他们得出结论:在人类记忆的范围内,可以可靠且准确地回忆过去的事件,并放大和扩大现有的书面记录。在人的记忆中有一部分记忆被称为自传体记忆,它非常稳定、永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变的,因而可以被称为“档案”。<sup>②</sup>类似的研究证明了记忆的可靠性,为口述历史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基础。然而,口述历史中存在不真实的信息也是不可否认的。即使如艾莉丝·霍夫曼所言及的记忆可以被归为档案,那么这种“自传体记忆”的形成本身是怎样的过程?其中是否存在“虚假记忆”或“不可靠的叙述”?又是如何鉴别与规避虚假信息与不可靠叙述的?

### （二）不可靠叙述与信度提升策略

首先,虚假记忆是信息在自动组合时产生的不真实的回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记忆比喻一块蜡板,上面可以留下印记或者编码,随后存储下来,以便我们今后提取这些印记。编码、存储与提取构成了今天人们有关记忆的基本构成。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者认为,记忆是一个选择性、解释性的过程。记忆不仅仅是被动地储存信息,在学习和存储新的信息后,会对其进行选择、解释,并将不同的信息互相整合,从而更好地学习和记住这些信息。“个体的记忆是自己的建构或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重构。”<sup>③</sup>那么,记忆的形成过程反映出叙述者不可能是全息成像式的回忆过去,而是编码再加工的过程,此间容易产生不真实的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口述者有意制造不真实的信息,而是

<sup>①</sup>K. Plummer, *Documents of Life: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17.

<sup>②</sup>A. M. Hoffman & H. S. Hoffma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ral history: The case for memory", in J. Jeffrey & G. Edwal (eds.),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on Recalling and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p.107—135.

<sup>③</sup>黄希庭:《心理学导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9页。

由于“受访人的生理机能衰退、记忆受损、自我保护本能、心理无意识、社会公众记忆、社会意识形态、理解能力与理解方法、表述能力及表述方法等原因而导致的”<sup>①</sup>。

既然虚假信息产生的原因极其多样,因而,在教育口述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当受访者出现机能性的言不由衷时,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并通过后期去查阅相关资料去确认每一个口述中出现的人物名称、时间和地方,因为记忆可能对于这些细节并不能予以足够的重视,还只是关注于事件本身。口述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能对叙述信息的真实性产生干扰,会对某些在他看来不利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遗忘与陈述,而把对他有利的东西予以放大,这就是为什么回忆录、自传多是对个人光辉一生的总结,而少有对个人过失的坦诚交代。教育口述史在整理的过程中要采取审慎态度对待此类事件,如采访某些有过失的教育事件时,既需要口述人还原历史的真相,同时又要考虑到口述人的感受。

其次,不可靠的叙述是来自于不可靠的叙事者的叙述。不可靠的叙事者是指在文学、电影、戏剧等作品中,可信度受到质疑的叙述。韦恩·C·布思(Wayne C. Booth)是最早以读者为中心去界定不可靠叙事者的,他以叙事者的言论是否符合或违反常规为由来界定叙事者是否可靠。他在论著中指出:“当叙事者按照作品的规范(即作者的规范)行动时,我称之为可靠的叙事者,反之,为不可靠的叙事者。”<sup>②</sup>然而,这种过分依赖规范与伦理的概念界定遭受到后来者的质疑与批评,彼得·J·拉宾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认为,不可靠的叙事者不仅仅是一个“不说真话”的叙事者。相反的,一个不可靠叙事者是一个口出谎言、隐藏讯息,对叙事对象下了错误判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言论可能是真实的,但并不是依据现实世界或原始观众的标准,而是依据他自己的叙述的标准。<sup>③</sup>

尽管不可靠的叙事者是作为分析的对象出现在文学等作品中,但为口述史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即当教育口述史的过程中遭遇不可靠的叙事者,同样对口述史的信度产生负面影响。从现实来看,那些具有一定叙事技巧的人可能更善于叙述,也许不是谎言,或许有故意隐藏信息,也有可能歪曲捏造事实。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可靠的叙述?按照布思的界定,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是权威而可靠的,也就是需要隐去作者,确保叙述的独立性。然而这一点对于教育口述史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口述史正是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叙述方式,叙述者便是历史当事人、参与者。从这个层面来说,第三人称的口述历史作品借助整理者之口,以及整理者在其中所进行的对叙述的鉴别、勘误工作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叙述的可靠性。

无论是虚假记忆,还是不可靠的叙述,都对教育口述史的信度产生影响。口述史料是作为理解历史的证据,且不是传统的文字证据,而是实施者或知情人提供的口头证据。这与法庭要求证人提供证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我们不可能像法官那样要求证人在陈述前宣誓所提供的每一句证词都是事实,没有任何的遗漏、偏袒。口述历史的过程是一种记忆的唤醒与陈述,是借助当事人、参与者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过去。我们需要尊重口述者,也需要尊重历史。

对于保证教育口述史的信度而言,需要做好几个基本工作:第一,做好口述前后的准备工作。不要害怕不真实信息,要有教育史学专业工作者的基本功,即做好相关史料的阅读工作,了解口述者生活的社会背景、同时代其他人的口述材料,尽可能的占有材料,并做好比对工作。第二,增加口述访谈的问题密度与细节。这样做可能会打破某些可能存在的口述者自己创造的事实,要求对细节的展示不仅会唤醒口述者对历史细节的追忆,也可能会打破口述者原有的记忆保护壁垒,得到更加真实的记忆。第三,设置一些重复性的问题。测试信度的基本方法就是让口述者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时间、地点进行重复。谎言或不真实的信息在重复的问题解答时会因答案的不一致而不攻自破。

①陈墨:《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1页。

②W.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p.158—159.

③P. J. Rabinowitz, “Truth in fiction: A reexamination of audiences”, *Critical Inquiry*, vol.4, 1977, pp.121—141.

### 三、教育口述史的伦理

#### （一）教育口述史的伦理

明确伦理道德与法律责任是确保教育口述史走向规范的基本保障。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方法、一门技艺,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场对话。它强调的是作为叙述者的主体人在教育历史叙事中的个体性、主观性、生动性,所以口述历史作品的可读性很强,但也正是突出这种个体性、主观性、可读性,教育口述史在制作到出版以及出版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伦理与法律问题。当口述者在谈论他本人的教育生平与经历时,做到忠实地呈现是没有问题的,而一旦涉及到对他人、教育事件的论述时,即使是很小的事情,可能会出现极大的反弹。明确教育口述史工作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口述者、涉事者和口述作品。

何为教育口述史的伦理与法律?口述史研究已经将此作为专题加以讨论。杨祥银在《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中专章论述了作为美国在口述史学的伦理与法律这一领域所做的工作,并指出当代中国口述史学要充分考虑到口述史学的规范建设。他认为,口述史学的伦理问题主要指口述历史访谈与记录、整理与编辑、保存与传播以及解释与应用等过程中不同关系体之间的一系列权利与责任。而口述史学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著作权、诽谤、隐私权侵犯、法律授权协议书、对于口述历史资料设限的法律挑战、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机制、口述历史资料网络传播与使用的法律风险与口述历史资料能否作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合法证据等。<sup>①</sup>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1.研究者(访谈者)与主办(赞助、保存)机构对受访者(叙述者)的责任;2.研究者(访谈者)与主办(赞助、保存)机构之间的相互责任;3.研究者(访谈者)与主办(赞助、保存)机构对专业本身的责任;4.研究者(访谈者)与主办(赞助、保存)机构对公众的责任。有学者将这些责任进一步具体化为一系列伦理议题,比如知情同意、匿名与保密承诺、对关系与名誉的可能性伤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叙述者与其他人的有害信息的公布、对研究成果的诚实呈现以及在委托服务中对于访谈者的保护等等。<sup>②</sup>

从美国口述史有关伦理与法律建设的进程来看,随着口述历史工作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口述作品及其相关人员的限制与保护。从本质上看,这是公共史学对个人空间的进入,也就是说,一方面公众对历史的需求日益增长,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公众满足历史好奇心的记忆之场;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口述历史将个体的经历与观感呈现在公众面前,完成了个体在社会记忆保存中的职能,同时也冒有将私人空间放在公共场域中让读者加以评判的风险。记忆的不可靠性、叙述的不客观性是这种风险存在的根本,可以说是无法规避。因而,建立一种公众与个人都能接受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体系,对于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是极其必要的。

#### （二）教育口述史的规范

当代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谈到中国史学的前途时指出:“现在有的把人口述历史捧得很高。不重视口述历史是不对的,但是将其功能无限夸大甚至于超过文献,我看也未必正确。不要说研究别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历史,就是研究自己的历史,你自己的回忆也不完全可靠。季羨林老先生就曾闹了个大笑话,他回忆北京快解放的时候胡适在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其实那时胡适根本就不在北京。后来他承认是记错了。所以,历史确实是不容易讲清楚的,但是如果太容易说得清楚,又何必需要这么多人

<sup>①</sup>燕舞:《“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经济观察报》2014年10月18日。

<sup>②</sup>杨祥银:《口述历史发展,组织化与制度化建设最重要》,澎湃新闻2017年5月26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938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9381)。



来研究它。不过,我认为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sup>①</sup>

无论是以文献还是以口述为基础而形成的历史作品,都无法保证绝对的客观,但“总还有个比较客观的事实”,这也是史学的基本底色与永远具有吸引力之所在,正是章开沅教授所言及的“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口述历史是赋予历史当事人自己言说客观历史的机会,至于究竟客观到怎样的程度,待其作为史料进入档案馆之后留待历史研究者去多方求证。因而,对待口述历史应有一个平和的态度,既不应过分拔高,也不应视若洪水猛兽,它们只是为历史贡献了可供研究的文本。随着口述历史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关注,多种形式的口述历史作品不断产生,要求出台口述历史工作规范的呼声一直很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教授指出,“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口述历史研究各自为战、杂乱无章。不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而且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整理者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常识及基本技能培训。制定口述工作的规范,是做好口述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从口述历史访谈对象的确定,到访谈问题的设计,再到访谈过程及访谈记录的整理和发表,都要有严格的学术规程。”<sup>②</sup>尽管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2004年成立之初,便已经有意识地集中力量制定相关章程、规则与工作手册,然至今仍未有公开出版的较为全面的口述历史工作规范。

我们在编撰“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丛书”的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以及结合其他口述历史工作者提出的基本原则,教育口述史的实践规范原则可能有:①主题收集原则,教育口述史项目的实施应在鲜明的主题下开展整体性的工作,追求整个结构的完整,通过完整的学术单元呈现某个主题的教育历史更具有历史意义;②充分准备原则,作为口述历史的采访者,事先与口述当事人进行良好的沟通是前提,并能确保这种沟通贯穿口述作品的选题与策划、整理与撰写、出版与销售的整个过程。③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原则,口述历史的开展必须以尊重受访者意愿为前提,在邀请受访者接受口述访谈工作时,要充分听取受访者的意见,不能强人所难。同时要尊重受访者意愿贯穿于口述史活动的全过程;④忠实于口述记录原则,口述历史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完成的结果,口述者是口述历史的第一主体,没有口述者的叙述便没有口述史,忠实地记录口述者所讲述的历史是访谈者的基本任务;⑤口述历史档案整体性收藏原则,首先,教育口述史作为一种档案反映的是个体记忆,能够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提供参考;其次,教育口述史作为档案有录音、录像还有与之内容相匹配的照片、文字等多种形式,这些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存储与传播比纸质版的档案更便捷。

## 四、结语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国内较早采用口述史方法开展历史研究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请了国内一批史学名家如刘大年、戴逸、毛昭晰、宁可、陈旭麓、林增平、李时岳、汤志钧、胡滨、萧致治、齐世荣等人为学生们讲授中外历史,这些名家在授课过程中即已提到口述历史方法的重要性。章开沅先生更是鼓励学生们运用口述史方法去采访武汉地区的一批辛亥老人,以抢救史料。笔者(周洪宇)还组织班上同学前去采访了在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任教的辛亥老人、十八星旗设计者赵师梅老教授。1982年在编撰《陶行知全集》时,也曾运用口述历史方法采访过陶行知的亲属与学生们。1989年,在《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一文中,笔者强调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应建立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立体方法论网络体系,以满足不同类型

①章开沅:《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②左玉河:《口述历史急需规范操作》,《中国科学报》2016年12月22日,第5版。



研究的需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笔者多次在全国教育史年会以及著述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运用。2008年,着手思考编撰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教育口述史研究丛书,于2014年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合作正式启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为主题,主要通过访谈的形式聆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高等教育改革家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在编撰本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与参与本套丛书的口述者、整理者们多次研讨什么是教育口述史以及如何去做教育口述史,更系统具体的论述请参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口述史研究丛书”。总之,口述历史在当代教育史学科建设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亟待学界共同建设。

(责任编辑:蒋永华)

##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Function, Reliability and Ethics

LIU Laibing, ZHOU Hongyu

**Abstract:**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history in general. As an academic practice, the rise of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dop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taking the memory of people in education practice as its main object,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plays the academic functions of preserv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education history, participating in building a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public education.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has been questioned in practice about its authent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narration. Analyzing its validity from such two aspects as false memory and unreliable narration is helpfu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s a research method.

**Key words:**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function; reliability; history of public education

**About the authors:** LIU Laibing,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Secretary General of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ZHOU Hongyu, PhD in History,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Hubei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Wuhan 430079).